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劳祖德整理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第一册

中华书局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第二册

中华书局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劳祖德整理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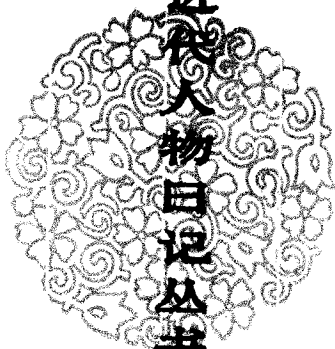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册

中华书局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劳祖德整理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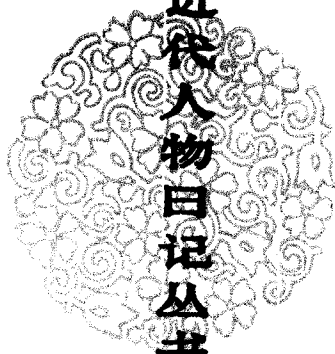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册

中华书局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劳祖德整理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

郑孝胥日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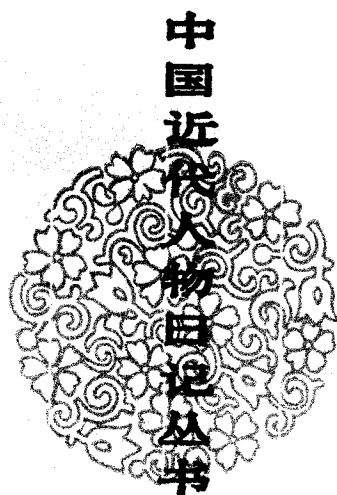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第五册

中华书局

郑孝胥日记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劳祖德整理

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郑孝胥日记

第一册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劳祖德整理

中华书局

责任编辑：朱 慧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郑孝胥日记

(全五册)

劳祖德 整理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昌平新兴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1/32·94 $\frac{1}{2}$ ·印张·2182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0册 定价：98.00元

ISBN 7—101—00577—2/K·244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郑孝胥日记

第二册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劳祖德整理

中华书局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郑孝胥日记

第三册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劳祖德整理

中华书局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郑孝胥日记

第四册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劳祖德整理

中华书局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郑孝胥日记

第五册

中国历史博物馆编

劳祖德整理

中华书局

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刊行缘起

编辑出版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，是为给有关学术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。

日记是人们对自已的活动、交游、见闻、学习心得以至思想感情的记录。一般来说，日记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，且又是当时的记录，因而它的内容也就比较具体、真实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日记中的资料，有的为一般史籍所不载，有的可与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，有的还可订正史籍中的讹误。中国近代的许多重要官员、学者、文人都记有内容十分丰富的日记。例如著名的《赵烈文日记》、《翁同龢日记》、《越縕堂日记》、《湘绮楼日记》等，都是被研究者经常利用的重要史料。

近代人物的日记究竟有多少种，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统计，但数量肯定是十分可观的。全国许多图书馆、博物馆和研究单位，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记，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，也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日记。这些日记，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，发掘、整理这批史料，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。

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除刊印一些著名的日记外，尤其重视确有史料价值的稿本或抄本。整理方法和出版形式，从实际情况出发，不求一律。有的可以作简要的注释，有的可加目录和索引：比较完整的日记可以单独成书，有些零散、片断的日记则可合为一册。

编好这部丛书,一定会有不少困难,但我们相信,只要得到各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学术界、教育界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,它是可以逐步充实、完善起来的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整理说明

《郑孝胥日记》，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，起自光绪八年壬午（1882年），郑氏二十三岁，止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（1938年），郑氏七十九岁，共延续五十六年。其中光绪十七年辛卯（1891年）以前的十年日记，除乙酉（1885年）一年始末完具外，各年均略有缺失，戊子（1888年）全年不存，仅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郑氏文札杂稿中找到了一份《沪役日记》，记此年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在上海为沈瑜庆经理轧钢公司事，今已据以补入。光绪十八年壬辰（1892年）以后的四十六年日记，则完整无缺。

郑孝胥（1860——1938年），字苏戡（亦作苏堪、苏龛、苏龠），号太夷，福建省闽县（今福州市）人。父郑守廉，咸丰二年壬子（1852年）科进士，入翰林，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，卒于光绪二年丙子（1876年），时郑孝胥十七岁。有遗稿《考功词》，郑孝胥为之刊行。

光绪八年壬午（1882年），郑孝胥以乡试第一名中举，主考官为礼部侍郎宗室宝廷。十一年（1885年）赴天津，投直隶总督李鸿章幕，随办洋务。李鸿章与郑氏岳父光禄卿、督办福建船政大臣安徽吴赞成有旧，颇优遇之。时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，郑氏尝受托代为课督其长子严璩读书。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考取内阁中书，留北京供职。翌年，兼充镶红旗官学堂教习。十七年，因李鸿章之子、出使日本大臣李经方奏调东渡，旋任筑地副领事。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移充神户兼大阪领事。甲午战起，下旗归国。郑氏先

已报捐同知，指分江苏试用，至是，遂入湖广总督、调署两江张之洞之幕，充督署洋务文案，旋充洋务局提调，并在商务局差委。先后共事者有黄遵宪等一时名士。郑氏反对和议，颇多谋画，为张之洞所赏。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受回任湖广的张之洞保举，至京引见，遂以道员候补，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，曾迭上《敬陈变法大要以备别择先后缓急》等折。变法失败，请假南下，抵湖北，任芦汉铁路南段总办。张之洞倚重之，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。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，佐张之洞镇压会党，并联络刘坤一等订立《东南互保章程》。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岑春煊督两广，奏调到省，委充洋务处督办、营务处总办。两广借调湖北武建军，郑即充该军统领，因“边防不靖”，由岑奏准督办广西边防事务，率军驻龙州。陆荣廷、陈炳焜乃所隶武建军当时将领。郑氏在龙州三年，因调度饷项，自立银号，又特留意地方教育，创设学社，开办学堂，筹拨专款，保送地方士子出洋或到上海游学。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自求解职去，在上海筑“海藏楼”以居，参预路矿、金融、工商、新闻、出版、教育等新兴事业，誉望甚隆，其诗歌、书法尤为时人所重，学部奏辟为头等谘议官，预备立宪公会举为会长，端方邀入两江督幕，岑春煊殷约共事，致电乃云：“公慷慨尚义，相知有年，即不念私交，宁不念国事！”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应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之聘，任锦瑗铁路督办，议定《锦瑗铁路借款包工合同》，又亲至葫芦岛踏勘，筹议开发设埠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受任湖南布政使。抵任接印之翌日，因有厘定颁行外省官制之事，即为湖广总督瑞澂电派进京，以备内阁谘询。郑氏抵京后，四川有抗路之事，密为盛宣怀划应对之策。端方奉命入蜀，邀偕行，未赴。武昌起义，盛宣怀、载泽并向之问计，迭有建议。以后局势急转，郑氏乃归上海。

此后十数年间，郑孝胥在上海作寓公，遵养时晦，曾一度闭门谢客，以示与世相遗。而实则盱衡中外，广通声气，多与日本朝野结纳，指使其子郑垂奔走南北，静观待变。既与若干遗老为“读经会”，每周一集，以诵习儒家经典为事，又与壬午乡试同年为“一元会”，醪饮酒家，经月一聚，共抒恋旧怀故之情。排诋时政，敌视民国，悬笔单卖字，凡书件之有民国字样者皆置不应。自云“宁使世人讥我之不达，不能使后世指我为不义”。一九一七年，得溥仪寄赐“贞风凌俗”四字扁，书于日记曰：“辛亥以来，海藏楼抗立国中，幸免天倾地陷之劫。今得御书以旌之，足为臣下之劝矣。”所作《海藏楼诗》共十三卷，其己丑（1889年）至甲子（1924年）十卷即于此时陆续编年刊行。

一九二三年，郑孝胥受胡嗣瑗等人鼓动，赴北京见溥仪，溥仪深加信重，即于宫中派为内务府大臣，佩带印钥，任领班。郑氏亟思振衰起敝，革易旧章，部署清理皇产，裁节经费，并曾建议溥仪出洋游历。然而形格势禁，徒托空言，未几即不得不“奏称开缺”。其《夜直杂诗》有云：“恩遇何曾得寸酬，蛾眉谣诼转遗忧”，即咏此时情事。迨溥仪出宫，郑氏亦随往天津，尝进讲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等史书累年。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，又同溥仪潜行出关。次年，伪满洲国成立，任“国务总理”，方逾半载，即递辞请，谓“容隐处此，徒糜岁月”，又云：“任总理已八阅月，所为者特司官部吏之事，而疲于奔命，颇自惜其精力销磨于无用之地。”然此时之出处去就既非郑氏所能干请，亦非溥仪所得擅断，媿婀诡随，至一九三五年五月方始解职。其后颇拟归老北京，亦不获行，淹留长春至死，时在一九三八年三月，郑氏七十九岁。

郑孝胥生当封建末世，颇知民生疾苦，早岁奋发有为，深思力学，一时以干略称。晚清所谓名督抚者争相延揽，士林亦谓其旧学

精邃，洋务谙练，直谅相与，事功可期。但即在此时也已有人指出：“其论多不足信，此欺世盗名者也”，又有人说他：“论事甚好，然不能作事”（以上引文均见于日记）。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封建意识的浓重以及封建士大夫的虚伪性，例如他后来经济裕如，其积聚实始于广西边防督办三年任内。平素自许过当，好为严刻之论，于所游处，或时加微词，或凶终隙末。先后规画甚多，成就殊鲜。终则以贞事一人作为节操，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，由遗老沦为国贼，助桀为暴，身败名裂。

郑孝胥一生的七十九年，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的首尾相当。在此期间我国所发生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文教上种种激剧变化，郑氏多身经目验，在他五十六年未曾间断的日记中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反映。尽管这些反映有些是模糊的，有些是扭曲的，特别是辛亥以后二十余年所记，往往辞致隐约，然加以辨析审度，并与其他资料相拼接印证，在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们看来，必定大有可取，应是一份极难得的记录。故予整理出版。整理情形如下：

一、日记原文悉出手迹，整理者不作任何删改。原文天地头或行间所加补注、追记，凡能纳入正文者即径加于适宜之处，不另出注；其不能纳入正文者以小字夹注形式加于当日日记之末。文中原有夹注仍以小字排印。

二、日记中原文日期全系阴历，兼用干支纪日又往往有误。整理时略去干支不录，并在原文日期后加圆括号注明公历月日。

三、壬午、癸未两年日记原件有本人删改手迹，径据改定稿整理，删改情形不另注明。此两年日记原有墨圈断句，整理时改为标点；以后各年日记原未断句，标点为整理者所加。

四、原文中有避讳字，如“董玄宰”作“董元宰”，“淳化阁帖”作“清华阁帖”，大概可一望而知，故照录不改。但为示敬的